

✓ 753
25

目 录

领导讲话

邓颖超同志在全国政协第四次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稿件选登

一、在艰难的岁月里——回忆阜新地下党的斗争生活

……………市政府顾问黄永德口述 抒华整理(10)

二、忆彰武攻坚战

……………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赵先顺(19)

三、关于一九三二年彰武柳河

铁路六桥被炸事件的两点回忆

……………彰武县法律顾问处 肖乃钧(25)

四、关于蒋军覆灭前的点滴回忆

……………孟敏航(30)

五、国民党军从海州狼狈逃遁之迹象

……………江永海(34)

业务知识

文史是个完整的概念……………吴修秉(36)

也谈“文”与“史”的关系……………潘纯(38)

邓颖超同志在全国政协第四次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同志们、朋友们：

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开了一个星期，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没有能够参加各小组的会，现在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杨成武同志说他是小学生，我觉得我还是个新的学生。同志们知道我过去做过统战工作，现在还在做统战工作，还参加统战活动，但是，对于统战机关内部的许多工作，包括文史资料工作和其他方面很多工作，我没有直接参加，所以我说我是新学生。在这方面，我还向大家学习。如果说要说些什么意见的话，那也是我选看了一些会议参考文件和简报，从那里头考虑了一点不成熟的个人的意见。我今天的讲话，没有经过主席会议的讨论，不能代表集体，只能作为个人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我想，我们政协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活动性的工作。根据我们政协机构的性质，包括参加政协的单位，包括政协的几个委员会和十几个工作组，要进行协商，要开会，要讨论，

要做决定。这些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今天我们不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会议是文史资料工作的专业性会议，我仅就这个专门问题来讲一点意见。我觉得政协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静的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就是属于这一类。它跟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方式、方法上不完全相同。他需要坐在那个地方，动脑子，看东西，思考、研究。所以，从形式上，从工作内容上看，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属于静的工作，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但是从其效果看，它又可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工作，扩大我们的活动领域，甚至连政协各个组的工作都可以包括到它里头去。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我们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看起来是一动一静，截然不同，但又不可截然分开。因此，我们说这两部分工作，都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说静的工作又可以转变成为活动性的工作呢？我们不去讲征集的时候要活动，就以扩大统一战线的联络面来说吧，文史资料工作是能够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的。你们会上发的材料和第九号简报都说明了这方面的好经验。在《广东试向港澳和海外征集史料的情况和反映》这个材料中举到两个例子：一是罗翼群、一是郭典三，我们文史资料登了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后代、亲属看到后，很受感动，声言：只要祖国需要，一定回来，并且表示今后要为使台湾回归祖国和祖国“四化”多做贡献，发扬祖辈的优良传统。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使另外一些人缩小了同我们的距离，有的甚至考虑回国定居。这不是把静的工作又变为动的工作了吗？所以，我们对文史资料工作不仅要重视它，而且要像刚才杨成武副主席说的那样来进行。他的发言，我都

拥护。我只补充一点，我们文史资料工作是要埋头伏案在那儿编辑，然后付印出版，看起来好像是单纯的文字工作，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的资料拿出去以后马上就会起到活的作用。这个文字工作就跟我们统一战线的其他活动性工作一样，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作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看到了文史资料工作的作用和影响。再说一点，就是今后要注意提高文史资料的质量。要广征精选，对收到的一些材料，不要因不符合我们的观点，不符合我们现在的目标，不符合我们原来的原则就轻视它。只有实行广征精选，文史资料出版的质量才能提高，它的作用也才能随之而扩大。

二、根据大家讨论的结果看，我们召开这次会议，是非常必要的。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我在政协常委会上提出的建议，常委会上没人反对，后来在主席会议上又作了研究，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是根据常委会和主席会议的决定进行准备工作的。在这里我声明，个人的意见，变成了集体的意见，就不再是个人的意见了。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在这里提一下，我们对于哪个人说的话，只能说是他讲了什么话，要少用什么“指示”。因为个人的意见总是有局限性的，不全面的，甚至是不成熟的；而且个人往往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我这次建议，也仅仅是提出问题，不算什么指示。而解决问题是靠今天在座的从各地来的有着文史资料工作的实践和经验的同志们，靠在会议领导小组领导下，大家共同讨论。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得到收获，达到预期的目的。关于这点，我要特别讲一讲，因为过去常常把个人意见当作指示，是指示，就好像非执行不可。现在，我们要强调民主集中制，不要突出个人，个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在一些很具体很小的问题上，

受着这种或那种不合宜的、旧习惯的约束，比如凡是负责同志的话都叫指示，似乎习以为常了。我看这个方式，这个习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今天，我们应当改一改。

召开这次文史工作会议，同志们都讲是必要的。而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根据在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召开以后，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应该跟上两个大会所提出的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同时，第三次文史工作会议是一九八〇年开的，至今已三年了，经过这段实践，我们也需要总结工作，回顾过去，发扬成绩，找出弱点和不足的地方，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以适应今天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通过开会的形式，从事共同工作的同志大家在一起总结。这个方式是必要的。这种总结的会议有大有小，有各种类别，有专题性会议，有综合性会议。我们呢，是总结文史资料工作。总结工作是为了使我们的工作今后得到改进提高，更有利于完成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无论什么工作，在一定时期内都应该总结，不能不作检查，任其自流。我觉得有时候在有些情况下是总结不够的。比如拿我们的国家计划来讲，我讲的是过去罗，对每年的年度计划，缺少总结检查，所以我们执行计划的情况，在第一季度不怎么的，第二季度好像进行得还好，三季度再一检查，离计划距离还很大呢，于是到第四季度就拼命地赶，赶着完成任务，结果呢，偏重于数量的完成，质量怎样就难说了。我为什么说这点意见呢？我是希望同志们今后重视总结工作和检查工作。一个季度、一个年度、甚至对某一类或某个专题资料发表以后，根据得到的反映，做一次总结，做一次检查，这样，就可以及时改进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总结工作，不是工作的

终止，而是工作的新开端，是为了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今天着重讲讲总结工作的重要性。这次会议，你们的简报中已经肯定是有收获的，解决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达到了提高工作质量的目的。我个人与你们有同感。会议的一个收获就是以后我们在编辑文史资料的时候，审查征集来的稿子的时候，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就是要看我们征集出版的资料对于爱国主义，对于我们国家，对于人民，对于后代是不是有利？有了明确的目标，在选择资料方面就容易统一思想，分歧也可以解决。不过，我们光明确目标还不行，还要确认求实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你们的简报中说，要做到实事求是是不太容易的，是这样。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就要有所根据吧。实事求是的材料，使人看到有所收益，能使他认识一个问题，了解一个问题，增加他的知识，这就提高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最近我看到报上登的民国史的资料，有一篇是写“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文章不长，在座同志可能看了。“四大家族”就是蒋、宋、孔、陈，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座大山中的第三座——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我们一定要把它推翻。但是到底这“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是怎样形成的，怎么发展起来的，它又是如何促进了国民党政府的灭亡？《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讲的非常好，都是讲事实，没有什么议论，没有什么水份，我推荐给同志们都看一看。我们的文史资料恐怕也应该在文字和内容方面加以注意，我们编这类资料时，不能够加以评论。只能以原稿为基础，对来稿进行核对，资料不足的，再想法补充，但不能加上编者的评论、议论；否则，就改变了文史资料本来的性

质。实事求是，就是要合乎历史，合乎客观存在。客观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对一件事、一个问题全面地去看、去研究，不能有所偏废，只重这面，不重那面。说这个人好，就光说他好，不能说他坏，这还有什么实事求是呢？拿一件事情来说，光说这件事情收获多大，成绩多大，怎么样胜利了，但是不能说它当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说这件事情的不足之处，这样做就不是实事求是，而是片面性。同志们说实事求是是不容易做到，问题就是在这里。但是，有没有办法做好呢？有。这次你们也肯定了，杨成武同志讲话也讲到了，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人、看事。对一个人，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切不可只看到他突出的一点，就加以评价。对于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要用历史的观点而不是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来写东西、审查东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材料、编写材料，那我们材料的质量当然就会提高，有科学性，有说服力，使人感受到益处，受到启发和影响。

三，我看有这么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到的各方面的材料怎么处理？是来多少登多少，来什么登什么，还是应当定出一个适当的办法？我看，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征集、处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资料要有分工，有协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要是征集出版近现代史资料，属于党史和党的军事史材料如果送来了，可根据分工协作的精神，将一些稿子交给有关单位去处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开发表还是内部发表，也应有个区别。有些比较长的、有份量的资料，可以作为专题出单行本。这个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

总的看，开这个会是有利于我们改进和提高工作的，能使文史

资料工作更好地发挥它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作用。在这里我再提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那么，写卖国贼、反动派的材料我们还要不要征集？要不要出版？我请同志们研究，首先请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研究。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教育人民，光有正面的材料还不够，还需要有反面的材料。我们光说某某卖国了，我们要爱国，某某是反革命，我们要革命，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事实材料拿出来。比如袁世凯，是怎么卖国的？西太后垂帘听政，可以不可以写？我觉得可以写。写哪些呢？写她卖国啊，投降啊，对帝国主义屈膝啊，这样人民才会懂得，我们要爱什么样的国家，国家要由什么样的人来掌权。请你们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党常说光有正面的经验，没有反面的经验还不够，还不足呢？反面教材可以使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反，为什么要爱？我觉得我们文史资料可以收集编辑一些反面的材料、敌人的材料。

我看到有个简报写到登了康有为、章太炎、张伯苓的材料，这些材料我没有看，不能提意见。但是写个人的材料，写现代、近代著名人物的传略也好，写他的历史也好，我们都要注意全面地来写，力求避免片面性。我们搞近代史料、现代史料，这非常好，可以由近及远。现在我们许多青年，包括中年，对五、六十年前的事情都不甚清楚，不甚了解。《人民日报》有个专栏，叫做“学点民国史”，我觉得民国以来的历史确实有许多东西是值得写的，应该让我们活着的老年人和中青年人都知道一下。如“四大家族”的材料我看了，对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过去我光知道“四大家族”他们是官僚资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我们要打倒它。但是，它是怎么样发家的我不知道，看了以后才知道他们要尽各种手段，把国

家财富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搜括到他们四家手里，对其他的他们还有控制权，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要打倒啊！我再给你们讲个非常简单，也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深思的事情，就是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作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件事情他侄儿侄女都不知道。“文革”中人家提出来了，他们来问我，这下对我们敲了警钟，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缺少历史的教育。一方面固然事情忙，另方面好象还用不着告诉他们。那晓得告诉晚了，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跨党分子，毫不奇怪，但那些年轻的红卫兵就不理解，共产党还加入国民党？！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有些秘密共产党员被安排在国民党机关，后来国民党实行独裁，实行法西斯专政，对于主张抗日、主张团结、主张进步的分子，稍为看出点苗头的就要抓人。这些人的确不是他们的人，是我们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员和左派，是我们派到国民党的机关去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是为了抗战救国，不是什么挖国民党的墙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这些同志不能再在国民党统治区呆下去了，我们只好赶紧把这些人的疏散撤退。解放以后，这些人到了我们一些机关工作，在我们妇联的较多，结果在“文革”中这些人就挨整得厉害，甚至于说，妇联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把我们党领导下的公开的全国妇女联合会竟说成这样！过去在国民党机关是隐藏有秘密共产党员的，“文革”中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也不跟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所以就搞错了一些人。最大的案子是新疆的案子，你们听说了。盛世才拘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也包括无党派爱国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被打成了“叛徒”。实际呢，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周恩来同志跟张治中这个老朋友交涉，

要他把这部分人释放。当时张治中在新疆，是蒋介石派他去解决新疆问题的。他办了这件事，把这些人放了，都送回延安了。建国以后，这些同志撒在各个部门。“文革”中红卫兵追问历史，噢，你是在新疆被捕过的，那都是叛徒。这个问题可费了大劲呢，我们的同志为这事挨整的不少。有的受了很大委屈，有的人得到保护就好一些。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不仅要“抢救”健在的老一辈的历史，就是从民国成立以来，孙中山怎么当总统，他的总统为什么当不长？军阀怎么割据、混战，这些材料，恐怕对我们中、青年都是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我建议是不是在近现代史中再划一下，划出一个民国史。

我今天没有多加思考，仅把个人的感触在这里简要提一提，供同志们参考，起到一点相互切磋之意。开过这个会以后，我们的工作该是什么样子呢？我看到会议九号简报上一段话，我把它念一念：“发言的同志一致肯定了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认为：总结中响亮地提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既符合于新时期统一战线为完成三大任务所发出的大团结、大统一的号召，也符合于我国近代、现代的历史实际，是我们进一步做好文史资料工作的指导思想；闻之使人豁然开朗，鼓舞奋起，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我和你们意见是一致的，这段话就作为我今天这个没有准备的讲话的结束语，作为我讲话的一个总结。开完会以后，会是散了，大家的责任却是加重了，回去以后，要自己振奋，还要鼓舞其他人和我们一起振奋。这样，我们才能思想一致、认识一致、步调一致地进行文史资料工作。我相信，文史资料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发挥更多的作用，来扩大我们的爱国

统一战线。会议结束了，新的工作又开始了。我愿与同志们一同努力，今后对文史资料要尽量地翻一翻，不能象过去那样，是会外人，旁观者，可看可不看，没有时间就不看。我希望，凡在政协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层人员，对于文史资料应当比过去更为重视。过去有些同志认为文史资料是出给别人看的，自己没时间就可以不看。这种态度现在看来不行了，应当改一改。我虽然这样说了，但究竟能看多少也很难向同志们作出什么保证，不过我很愿意在这方面跟同志们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

在 艰 难 的 岁 月 里

回忆阜新地下党的斗争生活

黄 永 德

我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曾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侦察科任侦察员。一九四五年秋末从延安来到当时的热河省承德市，任承德市社会侦察队队长。一九四六年九月受组织派遣，来阜新任地下党负责人。每当我回想起那艰难的岁月，回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更加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得多么不容易，也更加感到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一、来 阜 新 落 脚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党立即派大

批干部到东北。九月末，我随部队从延安到承德，任承德市社会侦察队队长。

那时，我们党的任务是组织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组织武装，保卫胜利果实。可是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不栽树却要吃桃子。八年抗战，他们躲在大后方，抗战胜利了，他们却要独吞胜利果实。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依仗兵力多，武器好，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

我党根据形势，决定放弃一些城市，转入农村，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九四六年八月，我们部队撤出了承德市。社会侦察队在承德市留下三个联络点，可时间不长，有两个点被敌人破坏，只剩下一个赵衡琪的联络点。但形势越来越坏，当时敌人很猖狂，地方武装的暗杀团也行动起来，到处杀人。一些满洲国的敌伪残军虽然和国民党还没直接联系，但也破坏我们的工作，给国民党通风报信。在这种形势下，组织上考虑，赵衡琪家住阜新，决定暂时放弃承德，到阜新一带外围地区开展工作。当时的社会部长王凡同志指示我到阜新一带落脚，等形势稍稳定后，与当时负责外线工作的沈平同志联系。然后联通义县、朝阳，在承德外围开展工作。临出发前，当时热河省省长李子光同志在我的一个小本子上题词：“要以神龙露首不露尾的态度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与敌搏斗，百战百胜。”面对同志们的关怀，组织上的信任，我心里热乎乎的，决心好好工作，报答党，感谢同志们。于是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同志们，离开了承德。

组织上安排我与赵衡琪的丈夫栾光辉一起去阜新。我装扮成栾光辉的弟弟，化名栾光华，身份是西北大学文学系的学生（因我

的口音是陕西味)。为避免敌人怀疑，我们绕到锦州，不几天顺利来到阜新，住在阜新县南门里的栾家。不久赵衡琪也从承德来到了阜新。由于栾家一家人的保护，我安全地在阜新落了脚。特别是栾光辉的母亲栾大娘，每次敌人搜查，都是栾大娘和儿媳赵衡琪冒着危险出面应付。栾大娘像对亲儿子一样对待我，给我做吃的，弄喝的，我这辈子忘不了栾大娘那张革命母亲慈祥的面孔。

时间一晃过去三个多月，到了规定的联系的日子了。可由于当时形势变化太大，我却和组织上失掉了联系。回想我十四岁在延安参加革命，十年来一直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这次和组织上失掉联系，使我第一次感到是那样孤独，象孩子没了娘一样。怎么办？我急得吃不下，睡不好。我不能没有党，不能没有党的领导啊！后来我从地图上看，阜新地区也归热河省管辖，我便决定到阜新北部一带农村寻找党组织。

栾大娘一家为我的安全担心，劝我等一等再说。但我说什么也呆不下去了，恨不得一下子找到党，回到母亲身边。

这时已是一九四六年底了。这年天气特别冷。一天，我化妆成农民模样往北走。走到离大沁他拉不远的地方，被我武工队给抓住了，他们把我当成了国民党特务。我被反绑着双手，跟在他们的马后往前走。走了一段路，遇到了当时民运部副部长张静超同志，他也是从延安过来的。我向他说明我是从延安过来的，在延安住在枣园，领导人是陕甘宁边区保卫处侦察科科长王凡同志。弄清了情况，同志们赶紧给我松了绑，并给我弄了好吃的，然后找来一匹牲口让我骑上，派同志送我到当时五地委所在地——大沁他拉，见到了担任五地委组织部长的曾志同志，城工部长丁丹同志。他们和蔼可亲，问寒

问暖，认真了解了白区情况，然后让我好好休息。

见到了亲人，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后来经组织上联系，把我的关系从承德转到了五地委。这时，我才真正算是在阜新落了脚。从此，我便在丁丹和曾志同志领导下进行阜新地区的地下工作。

二、在群众中扎根

一九四六年十月，五地委派我与阜新市内地下党的刘昆同志接上头。刘昆同志介绍了当时的阜新情况，认为阜新的形势对我党开展工作很有利。那时，阜新人民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很深，现在日寇垮台了，老百姓心里特别舒畅，感到再不当亡国奴了。他们盼望着有一个安定的局面，建设自己的家园。他们开始时对国民党寄予很大希望，以为国民党总不至于不如日本鬼子。但是时间不长，老百姓便从国民党贪污受贿，欺压百姓，腐败透顶的作风上看清了国民党和日本鬼子都是一路货，他们失望了。这些事实也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救星，只有八路军才真能为老百姓办事情。所以许多人背地里骂国民党，还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这里不养爷，爷去当八路。”这一切都反映出当时阜新人民渴望翻身解放的心情。

刘昆同志在向我介绍情况时，谈到了一个叫王振武的大夫。伪满时他在伪军里当过军医，但这个人很有民族气节，同情共产党，还救过我们的同志。根据这些情况，我们研究感到，这是党在白区应该依靠的对象。于是我们悄悄地来到他开办的健生医院（在现在市银行对过不远处）。经过一番工作，以后这里便成了我们地下活动的一个联络点。我们利用医院这个有利条件，经常集合在王振武

家里，部署任务，汇报情况。健生医院对过的楼房（现市银行）当时是国民党市党部，我们也借助医院的小窗户监视敌人的活动。在后来的工作中，王振武同志在经费、物资、药品等方面都给我们党以支持，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不幸的是，文革中他却含冤死于狱中。每次想到这些，我心里都很难过。王振武是个好同志，我们是不应该忘记他的呀！

一九四七年初，组织上派当时任奈曼旗委书记的赵任远同志来阜新，视察阜新地区情况，侦察了解敌人动态。当时的阜新驻满了国民党军队，封锁比较厉害。赵任远同志化妆成阔老，我扮成跟差，顺利地进入了阜新城。在阜新视察后，我和赵任远同志又回五地委向组织汇报情况。组织上考虑阜新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当时形势，决定派赵任远同志负责阜新地区的地下党工作。并指示我们任务是：联络群众，积蓄力量，宣传革命，瓦解敌人。不久，赵任远同志便以大公报驻阜推销站的身份和马恩波（新立屯人，现矿务局机电修配厂退休干部）到新立屯一带活动。在这之前，我已通过赵衡琪与当时任东北保安第三支队第九团团长赵序武干父女的关系，当上了该团的副官。我身穿国民党军服，整天和魔鬼打交道，但我并不感到孤独，因为党组织时时刻刻在领导着我，指示着我，给我以智慧和力量。

为完成组织上布置的“联络群众，积蓄力量，宣传革命，瓦解敌人”的任务，我们地下党充分发动群众，扩大联络点。那时阜新城里敌人很嚣张，但却不敢轻易出城。阜新城周围全都建起了我们的联络点。大巴一带有高克明（现阜新县扣莫医院院长）和李大爷、赵柏等人；东梁一带有魏恩寰、宋荫含、魏烟村和佛寺大喇嘛

单森尼玛；王府西灰同和八家子一带有老石家、老齐家和老庄家；孙家湾一带有赵国凡；尹家窑一带有倪春启、陈志州；阜新县城一带有郭九尊、王蕴朴、朱东仁、石成章、李荣实、赵衡琪、栾光辉等；阜新市里有王振武、刘南、孙洪志、李玉堂、刘颖、赵振中、赵振贤、崔武勇、高贵华、张士城、赵国瑞、张实伟、林华山等，还有一些已记不清姓名。当时地下党正是靠这些同志的支持开展工作，打击敌人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光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有功劳，要多说人民的养育之恩，正是这些人民群众的支持与爱护，我们才能在阜新扎下根，没有这些英雄的阜新人民，我们要开展地下工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常说：阜新人民对我有恩情。

有了这些基本群众，我们党开展工作就顺利得多了，无论敌人有什么情况，我们马上就知道，我们无论到哪里，都有群众的帮助掩护。那时我白天是敌保安团副官，晚上就带领区小队出来活动，打击敌人。记得一天夜里，天下着雨，我和同志们来到尹家窑倪春启家，想了解一下这一带的情况。同志们又累又饿，可老倪家也几顿没揭开锅了。为了能让同志们吃顿饱饭，暖暖身子，老倪腰里掖上一条口袋，一头扎进雨夜里，约有一袋烟的工夫，背回来半口袋高粱穗子。大伙一起动手，打的打，舂的舂。倪大嫂给大伙煮了一锅高粱米粥。同志们喝着比蜜还甜的稀粥，看着老倪淋得湿淋淋的样子，真不知说什么好，都从心里发出一句话，多好的人民啊！

三、依靠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在地下活动中，我党非常重视群众工作，这是我们能扎下根的基础。当时大巴那儿有个老人，大家都叫他李大爷，是当时“青红帮”的小头目。但此人很有爱国主义思想，他在一些群众中，特

别是那些地主武装里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就派人和他联系。经过工作，老人对我党有了认识，经常帮助我们开展工作。他常劝说那些“民团”等地主武装不要跟八路军作对。他说：“南为火（指国民党）北为水（指共产党），水火相争，谁胜谁负你们要看清楚了！”在他的工作下，有些地主武装成员不干了，有的把枪交给了区武工队。解放后，我当了副市长，请老人来市里吃了一顿饭，感谢他对我党的帮助，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却说，我不图别的，只图你们把我算做共产党一边的人就行了。

一九四六年末，党组织决定我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敌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干训班。在这个国民党下级军官的训练班上，党组织搞了大量活动。我们发展了刘南、赵振中、魏恩寰等我党的外围人员。靠这些外围组织，联络一些青年军官，以同学身份向他们渗透进步思想，对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进行巧妙的斗争。

保安团中有个连原是“大刀会”组成，成员大都是贫苦农民。国民党用愚昧政策迷惑他们，为其卖命。我们地下党就暗中对“大刀会”中的一些人进行破除迷信的教育，宣传进步思想，使他们不要为国民党卖命。在这期间，我受党的指示，经常与国民党保安第三支队司令韩梅村的秘书邓钧洪接触（邓是共产党员，是我党早年派到敌人内部一直做韩的工作的。后来到一九四七年五月时，韩梅村把队伍拉到凌源一带举行了起义，成为当时东北国民党军队起义较早的将领之一）。

青训班办了二、三个月，结束时我和刘南、魏恩寰等同其他国民党军官一起，被分配到各连当干部。当时五地委指示我们要利用这一条件，多接触士兵，多做瓦解敌军的工作。刘昆同志当时在连